

小人物 大人物

记者这份工作是新奇和有趣的，让我好奇和坚持。它总是让我能够接触平常不太可能接触到的人，不管这个人，是已经声名显赫的大人物，还是如草芥一样的小人物。平心而论，我更愿意倾听小人物的故事。在这个迅速变化的浮躁时代中，寻常草民的悲欢，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活着或死去了的真实状态，他们不为人知的生活和追求，时时提醒着自己，别忘了本。

木闻 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本书著者是西安一名记者。本书选取著者自二〇〇〇年至今十余年采写的五十余篇人物报道。

通过这些人物的人生经历、悲欢离合，从一个记者的视角，观察和记录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正所谓小人物有比大人物更值得关注的闪光点。

本书二十余万字，图片百余幅，除署名外，均为著者拍摄。

小人物 大人物

木闻 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小人物 大人物 / 木闻著. —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
ISBN 978-7-224-1000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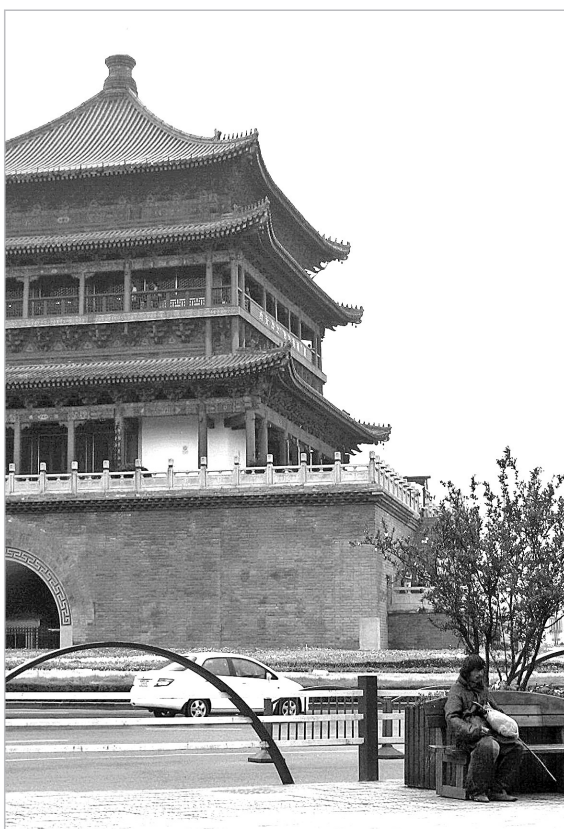
I. ①小… II. ①木… III. ①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6826号

小人物 大人物

作 者 木闻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陕西龙山海天艺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6开 23.25印张
字 数 415千字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10009-9
定 价 39.80元



二〇〇六年五月二十日。西安。钟楼。

就像这张图片，人们往往会先看到那些光鲜的东西，而忽视了角落里还有个人。他坐在城市喧嚣的中心，却像不存在一样，无人喝彩无人理睬。他不知从何处默默地来了，又不知往哪里寂寂地去了，仿佛从来不曾出现过。这本册子里，大多数，是这样的小人物。

写在前面的话

我的成长，与一个大杂院有关。那是在西安城墙里的东北角。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从农村到古城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我的爷爷奶奶来到这里，成为租住公家房的一户，从此住下来。十岁那年，我开始在这里生活，此后整整十七年，度过了我的小学、中学和大学，还有工作的头几年。将近五十年历史的大杂院终于在二〇〇〇年拆掉了，原地盖起了十几栋楼房，有不少老住户又迁回来，只是我家搬走了。有一年冬天，我陪奶奶去新楼房，见了很多老邻居，他们聊了一个下午。可现在，才过了没几年，这里又拆成了一片空地。上个月的一天，我站在城墙下，对着这片空地拍了一张照片。在我心里，这片空地就像过去那样清晰可见，一排排狭窄的巷道，一间间挤在一起的低矮的平房，热热闹闹地，住着几千口人家。

这里紧挨着火车站，人员复杂，而老住户大抵都是社会底层的平头百姓。上班、做工、娶妻、生子、念书、辍学、吵嘴、打架、离婚、同居、洗衣、做饭、喝酒、吹牛、养花、遛狗、出国、省亲、过年、放炮、纳凉、生火、扫雪、盖房、祝寿、聚餐、打针、熬药、死亡、告别……也有吸毒、赌博、判刑、释放……家长里短，众所周知，活生生一地鸡毛，轰轰烈烈，又平平淡淡。

我就在这种寻常草民的环境中长大。回过头去看，它在我身上留下了不能抹去的刻痕，塑造着我的个性情怀，以至于影响了我的人生走向和行为方式，包括现在所从事的记者职业。

老实说，我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记者。我是用沈从文先生的一段话表达着内心。从文先生在他的《花花朵朵坛罐罐》扉页上说，我总仿佛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就更适当一点，我总觉得有一个目的，一件事业，让我去做，这事情是合于我的个性，且合于我的生活的。

就这么着，我做了十多年记者。相比去追逐那些硬邦邦冷冰冰的突发事件，以及所谓的热点焦点，我总是更喜欢，或是有意无意地，把目光投向芸芸众生中沉默的大多数。我熟悉他们的生活，熟悉他们呼吸的那片天地。说到底，这些人其实就是我自己。他们中的大多数，多数时间，只是平凡地捱着生活。只不过，由于某一个新闻事件，在不经意间被裹挟进去，就像卷入江水中的漩涡，身不由

己，一时成为被注目的人。但这种情形只是短暂的，更多的时候，还是归于平静，在广阔的水面上漂浮着，起起伏伏，飘飘摇摇，无人关注，默默一生。

记者这份工作是新奇和有趣的，让我好奇和坚持。它总是不断地制造机会，让我能够接触平常不太可能接触到的人，了解平常不能知晓的事。不管这个人，是已经声名显赫的大人物，还是如草芥一样的小人物。平心而论，我更愿意听小人物的故事。寻常草民的悲欢，才能在这个迅速变化的浮躁时代中，时时提醒自己，别忘了本。

这些年下来，我在这座城市里，也常常跑到别的地方去，见过很多人，听过很多故事了。这些人大多是中国人，也有外国人，男女老少，干什么的都有，将军、科学家、学者、作家、老师、医生、艺人、官员，更多的，是普通的农民、村妇、老战士、志愿者、乡村教师、农民工、矿工，还有和尚、道士，以及以前从未见过听说过的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人，也包括罪犯，所谓的坏人。有人已经故去，但故事还在流传。有人不过是一面之缘，擦肩而过，我只看到了他一个模糊的身影，最终写出短短一篇侧记，往往还言不由衷。

但只要有机会接触到，我就很投入地听他们的故事，哪怕他絮叨一个下午，说的与我最终所写的几百字没有多大关系，我也不会打断他，安静地听和观察，而不是风风火火、我问啥你答啥式的所谓迅速采访。有个前辈说过，一个记者，最糟糕的，莫过于话太多。

我还会额外花些工夫，从他所说的一点经历、一桩旧事展开来，挖一挖时代的特色和气息。有时，我会因此泡到图书馆里去，连着几天翻找历史资料，发现那些被忘却的、被忽视的旧闻和新闻，乐此不疲。然后，再把他们的故事写成文字，用一个不得不有的新闻由头刊发出来，讲给更多的人听。

长长短短、良莠不齐的文字堆积得多了，就有了这本册子。一个记者眼中的一些大人物和更多的小人物。或许可以这么说，大人物也避免不了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而小人物，也有像大人物那样值得关注的，尽管可能是平淡无奇，但也同样个性独特的人生。我写他们，不过是想留下他们在这个世上的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痕迹。其实正是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活着或死去了的真实状态，他们不为人知的生活和追求，因而构成了草民的历史，也丰富着这个世界。

能为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写下几笔，我很愿意，将来有机会，还会继续这么做。

木闻

二〇一〇年冬天

目 录

农民先觉杨伟名
西安出了个“铁市长”
农民田焕新
耀邦叔叔不允许我们“走后门”
连战的妙言
陕籍开国少将范明的进藏传奇
“神舟飞船之父”戚发轫
吕日周：建言老乡郭台铭学习“吕氏工作法”
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万众期待中的低调与高调
抗战伉俪
抗战仁老兵个个英雄汉
周总理侄女周秉德“发飙”记
西安有个漂亮妈妈
有一种母爱叫做坚持
他们的青春：西安智障青少年生存现状（上篇）
他们的明天：西安智障青少年生存现状（下篇）
一份反悔的生命契约：白血病患者虹女士的遭遇
讲不出大道理但知救人要紧：骨髓捐献志愿者、湖北农妇李喜枝的故事
好人李君会：他走了他给老区乡亲募集的书寄来了
傻哥李智
掉队的女兵
临时厨师
“帐篷政府”的公务员
《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这一年
北川姑娘李淼的另一种“寻找”
时尚女子鄢炎的“双城记”
乡村代课女教师耿小贤的前半生
多面周正龙
人生最后一站
精神病院的故事
扫地的老人
盲老汉的幸福生活
居委会来了个年轻人
鹭尾先生

白鹿原畔的契丹后裔耶律氏
秦镇凉皮和乡贤
心地永久善良：民间藏医齐母·洛桑旦增
农民于运河：人生的意义在于不断“成精”
商洛农民郭书君闭门造“车”
车手乔峰
魔术师掌握着秘密的人
佛家庄主人
美女·道士
岩田隆造
来华谢罪的日本七旬苦行僧
当仇和遇到释永信
国际投资大师罗杰斯：我人生的最大失误是前妻
清水拓野：一个日本博士的秦腔缘
“昭陵六骏”两匹马和那些人
昔登状元榜今为状元师：一九七八年陕西省文科状元韦成枢
年轻人被吹神了他的一生就毁了：一九八〇年陕西省文科状元于彦智
高考大学只是人生历程中的一站：二〇〇二年陕西省理科状元史方舟
北京奥运：胡同里的那些人那些事
“蛆橘”漩涡中的旺苍农民
艳舞救妻农民工王傻儿的爱情
白家兄弟别无选择的黑色人生
被弃尸荒野的鞭炮厂农民工





杨伟名是个农民。如果他只是握着锄头，一辈子在黄土里默默刨食，或许现在他还活着。

但现实不是这样。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这个陕西户县的农民拿起笔杆，针砭时弊，一写就是近万言。恐怕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些文字会引起最高领袖的震怒，最终把他引向绝路。他只活了不到四十六岁。

四十多年过去了，杨伟名的名字沉浮乡里。一度，曾被发现式的骤然提起，像当年写万言书时引起的震动那样，朝野上下无不为他几十年前的大胆思想震惊、又为他的悲情际遇怅惘。最终，这个名字又渐渐归于沉寂。

而他的亲友，至今承担着 he 带给他们的光荣，也隐隐背负着似乎总也逃脱不掉的伤感和压抑。

农民先觉杨伟名

引子

几年前，杨新民背着几袋书到街上去卖。这是陕西户县的文化一条街，街上有个农民画展览馆，附近还有所中学。

新民把书在地上摆开，蹲在一旁，也不吆喝。

来往的人很多，却很少有停下来看的。

那是本一半橘色一半黑色封面的书，印着几片枯黄的枫叶，书名《一叶知秋》，还有行小字“杨伟名文存”。

有个学生过来了，翻了翻书，指着“杨伟名著”几个字，问，这作者来了吗？

新民愣了一下，说，他，他已经去世了。

学生又问，那你是谁？

新民说，他是我父亲。

学生把书细细翻了半天，问，你爸写的农村情况，毛主席为啥要批评呢？

新民不知该咋回答，闭着嘴，把喉结咽了一下。

一个农民的非常之死

多少年了，新民不能提这事，想起来就是两眼泪。父亲去

世时，他刚十六岁，还是个半大孩子。那几天连着下霖雨，街巷泥泞不堪，整天闹哄哄的，造反派把大字报从北街七一大队的家门口一直贴到不远处的钟楼上。

那天晌午，临出门时，父亲让新民把出嫁了的大姐彩英、二姐新惠都喊回来，说是鞋底烂了，让她们回来上鞋底。新民到邻近的连丰大队找到二姐，说，现在“文化革命”运动紧，咱大（陕西方言，爸）在公社正“实行专政”呢。新惠绕到西街上的公社，那围了一圈人正在喊口号开批斗会，趴到窗子上一看，父亲跪在箱子上，上面铺着一层煤渣。新惠没办法，含着泪回了家。

晚上，民兵连长把父亲押了回来。大姐熬了一锅包谷糝，父亲好像也没吃，像往常一样，在炕上盘着腿，趴在小桌上，攢着头写啥东西。末了，对新民他们几个说，没啥事了，都去睡吧。

那时杨家三间土房，父母住北间，新民住南间，中间隔着一间。雨很大，新民几个躺下没睡着，听见北间有动静，有人生火拉风箱。彩英起来问母亲，现在烧水干啥。母亲说，你大渴了，烧水喝。彩英说，电壶都灌满了，有开水。母亲没理会，说你去睡吧。

一会，又听板楼上响，姊妹几个问谁干啥呢。上头应了一声，取个东西。就没了声息。只听雨声越发得紧了。

似睡非睡中，忽听那边隐约传来低沉的嘶吼声。新惠第一个冲过去，门却从里头插上了。门缝中透出一股呛人的农药味。新惠几个一边哭叫着打门，一边点煤油灯，却被风吹灭了四五次，索性不点了，摸黑跑到后院，撞开窗户，爬进去，拉亮家里唯一的电灯，就见父母直挺挺躺在炕上，穿戴整齐，挽手赴死了。

床上，倒着个农药瓶子，地下，是父母刚洗净身子的一盆水。

已经是后半夜了。新惠忘了害怕，一个人一口气跑到医院，却没能把医生喊来。新民和大姐跑到巷子北头，拍打一户大夫家的门，没人应，又跑到另一头另一个大夫家，狠劲地叫，还是没人应。

过了很多年，新民思量起这一幕，才明白过来——那阵子，谁敢来呢？

姐弟三个守着父母遗体，嚎哭了一夜，不知该咋办。

天亮时，陆续来了群众，有人说，咋就走了这条路呢！更多的人光是叹气。公社也来了个干部，新民到现在也不知他叫个啥，但记得他的模样，只听他说，大家都不要看了，都回去，这是杨伟名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总是有好心人帮着张罗后事，准备把木板楼拆了，钉两口枋，后来听说电影院隔壁有个蓝田人开的棺材铺，还有两口枯木棺，便宜，一百八十元的债就记到了新民头上。第二天，就匆匆下葬了。

乡俗亡人上路是脚前头后，但板车太窄，没法把两口棺材的大头都朝后，

新民只能让父母手足相拥，牛车拉着，埋在了涝河岸边。

新民记下父亲去世的那天，是一九六八年五月五日。

领袖和农民之争

在新民的记忆中，父亲除了下地干活，到生产队开会，就是晚上在家写东西。上小学的一天，几个老师看到新民，就嘀咕着，这娃他大写了篇文章，不得了，人家毛主席都看了，结果他大挨批判咧。

新民回了家，看父亲还趴到炕桌上写呢，到吃饭时也不动弹，不高兴了，把饭碗朝桌上一蹶，头一拧，撂下一句，成天写写写，我要是被人家批评了，就把笔砸了，今辈子都不动笔了。

父亲居然没生气，笑了，说你娃们家知道个啥。笑完又补了一句，这次没写好，下次咱朝好里写么。

新民确实不懂父亲写的啥，到现在他说自己也只明白个皮毛。但杨伟名写的，不是个小事。

大跃进轰轰烈烈——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公社食堂就是好，想吃多少吃多少。这些口号还在耳边响，三年困难跟着来了，外省饥民涌进关中，庄稼歉收、黑市粮价狂涨，杨伟名“所见所闻，势如汹涌狂涛，冲击胸膛。每于激动之余，口述笔道，常至情不自禁。”他写道，“就农村而言，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他很疑惑，“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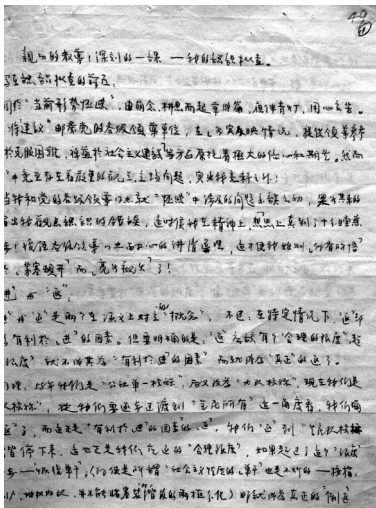
杨伟名一连提出十个问题，希望党和政府拿出“当年主动撤退延安的果断精神”，“大胆考虑”，给国民经济开出“处方”，“解带松腰”，“恢复单干”，顺应“价值法则”，“自由交易”，最终达到“劳动致富、生产发家”。

当时新民才十岁，哪能明白这些。现在他当然知道了——这是一九六二年五月，这些话那时说出来，确实不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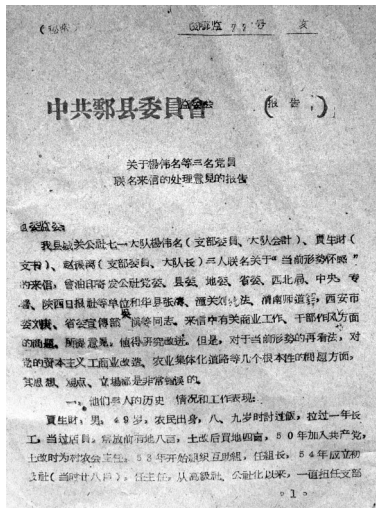
新民记得那一阵父亲每天光是个写，吃饭时也不放笔。新民问他，还给你舀碗饭不？父亲却反问，我吃几碗了？新民如果说两碗了，父亲就哦一声，说，那就不吃了。

就这样，杨伟名洋洋洒洒写了近万言，起了个标题《当前形势怀感》，大队支书和大队长都签了名。杨伟名油印了几十份，县上、省上，寄出一大堆。

新民不记得父亲最初收到一些肯定的复信时，是高兴，还是激动。他后来



陕西省户县档案馆保存的杨伟名一九六二年九月被迫写的检查，标题是《亲切的教导，深刻的一课》



陕西省户县档案馆保存的“三名党员来信”处理文件

听老人说，那一天，父亲在麦场上和社员们正碾麦子，信来了，父亲就地大声把信念了几遍。可没过几个月，新民听到老师的议论，毛主席批评了“户县三名党员”。领袖认为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这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父亲是执笔的，责任最大。

杨伟名因此受到批判。新民太小，不知道害怕，也不知父亲当时的心情，是 不服，还是苦闷。几十年后，他才听说父亲写了个“检查”，标题是《亲切的教导，深刻的一课》。他想，恐怕就是他撻话激将父亲不要再写的那次，父亲写了这个检查吧。

但这事没有完。几年后，当新民跟着几个伙伴学红卫兵搞所谓的串联，在西安待了一个晚上返回户县时，发现父亲又被揪出来，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牌子，名字上打着大大的红叉，几乎天天被批斗。

后来，西安冶院的一个大学生，叫刘景华的，不知怎么跟父亲成了“杨刘反革命集团”。批斗更加猛烈。

再后来，父亲就丢下新民，在那个晚上走上绝路。

他不像个农民

杨家的成分是中农。杨伟名的父亲小名根娃，是户县石井下庄人，从小苦

命，没了父母，旧社会在县城流浪，后来到南街一个大户人家当“拾掇娃”，就是送饭的——过去，有钱人从饭馆订餐，送饭用的是木饭盒，几个盒子捡拾了掇在一起。这户人家有个做饭的，叫万家寡妇，收养了他，后来就过继给万家。根娃本姓杨，改名叫杨万有，顶了两家的门户。

杨万有后来在县城北街开了个小磨坊，磨面度日，娶妻生子，长子叫长水，就是杨伟名。杨伟名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叫万志成，撑起万家的门户。

这些百八十年前的老事情，户县文化馆原馆长刘高明都考证清楚了。还有个八十六岁的老馆长谢志安，更是一清二楚。

谢家跟杨家是世交，谢志安比杨伟名小一岁，从小一块上学。杨伟名十岁时，开始念私塾，读的是“老书”，《三字经》、《弟子规》之类。十二岁到另一家私塾读四书五经，老师是“关学”名士王震京。王震京的老师现在一说都知道，大名鼎鼎的蓝田牛才子牛兆濂。这么说，杨伟名其实是牛才子的徒孙。

书读到十五岁，家里没钱供杨伟名了，他一边种庄稼、磨面做生意，一边借志安的课本看，高小、初中、师范、农专，志安学啥他看啥，不懂的，常常请志安到涝河边给他讲。杨伟名很聪明，会木匠手艺，制作过一架二十捻的纺线车。但他一开始不懂怎么画圆，也是志安教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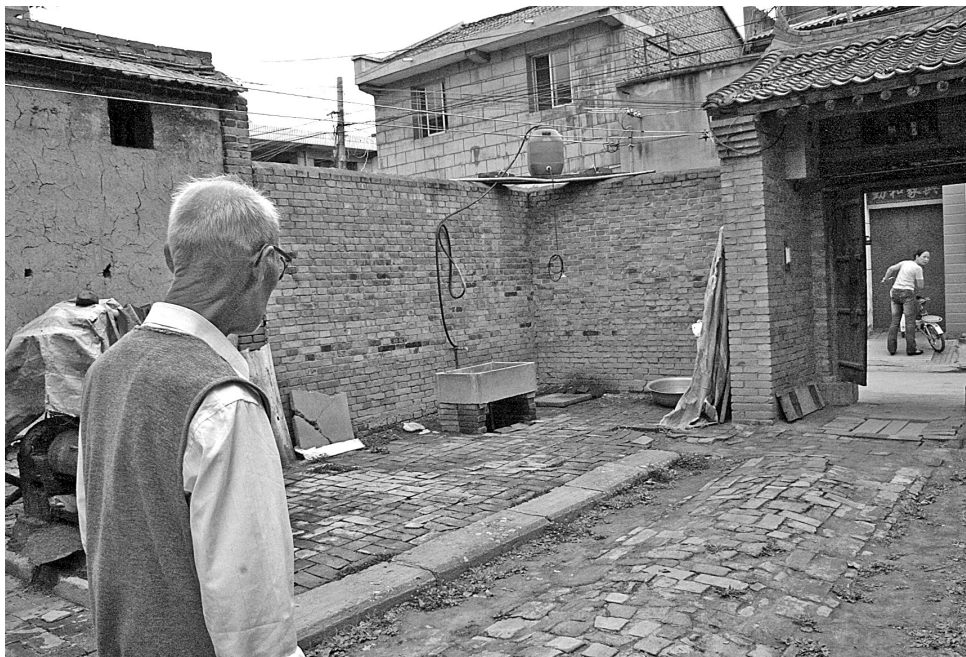
谢杨两家只隔一道墙，雨水把墙泡塌了半截，也不垒起来，有啥事一跨就过去了。在谢家四女党英的印象中，杨伟名穿得很干净，夏天是对襟白褂，冬天戴个棉帽子，围一条褐色围巾——不是一股脑缠在脖子上，而是前头搭一半，一半甩身后——若是除去手里掂的那把锨，咋看也不像个农民，倒是个知识分子的模样。

杨家北隔壁有个邮递员叫鲁和的，每天上午到邮局领了报纸，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去送。杨伟名常常在中午就把报纸借来翻一遍。

解放前，杨伟名被拉过几年国民党壮丁，后来逃回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工作，一九四九年二月入党，户县解放后，还当过一个乡的副乡长，后来家庭拖累，又脱了党回到老家。

一九五七年，杨伟名重新入党，越发关心国家大事。第二年搞人民公社、大跃进，生产队没地方办“大灶”，杨伟名把房子腾出来，自己借住在谢家。后来“大灶”不办了，杨家的板楼继续当大队仓库。杨伟名死后，清点物品，啥都没丢，唯独少了一瓶农药。

批斗杨伟名时，谢志安也跟着陪斗。身为文化馆馆长，本来就是被打倒的“走资派”，造反派抄杨家，发现一大堆谢志安的书，到谢家却又发现杨伟名油印的上书材料，于是每次开批斗会，都把牛棚里的谢志安提溜出来，押到北街



杨伟名的老同学、八十六岁的谢志安在杨家老宅。他目视之处，原来有间房子——一九六八年五月，杨伟名在此服毒自尽（题图 杨新民提供）

小学的会场。也只有这个时候，老友才能相见。

杨伟名写《怀感》时，他俩还交换过意见，志安同意他的观点。杨伟名自杀的消息传到牛棚，志安只有在黑了睡下后，悄悄流了些眼泪，不敢叫人知道。

这些事，新民以前都不知道，但他把谢志安叫大伯，让他的娃把老人叫大爷。

留给后人的痛与光荣

户县县城北街西巷二十号，是杨家的老宅。现在新民一家不在这住，房子赁出去了，他很少来。

新民的生母马氏死得早，丢下新民几个还小，两个姐姐送到姨家养活。新民六岁，父亲娶了刘氏，俩人夫妻十年，后来一同喝药走了。

后母脾气坏，有啥事总是高喉咙大嗓子。后母在前房喊，新民常见父亲在后院树下，跟没事人一样小声唱戏。

新民渐渐长大，二姐新惠也接了回来，后母常跟几个娃有矛盾。唯一的一次，父亲让新民陪他出去走走，说，人总要不断适应环境——意思是让新民跟后

母搞好关系，没想到这句话却成了父亲离世后，新民艰难度日的心理支撑。

杨伟名趴在炕桌上最后写下的，只有几行字：借青羊寨姨婆家一斗包谷、欠县城西街一个修眼镜师傅三十元钱。又让弟弟万志成念及手足之情，多操心新民，最好让他学个木匠手艺，将来能养活自己。这就是全部的遗言了。

杨伟名丢下儿女，瓮里没有一点面，年底生产队盘账，还欠大队一百多元，都转到新民头上了。

从此，新民跟一个成年劳力一样，每天出工、干活。大人一天挣十分，价值五毛钱，新民干一样的活，挣四分，两毛钱。家里就剩他一个，吃饭胡凑合，往往几口干馍没啃到嘴里，上工的钟又响了。冬天喝口凉水，含在嘴里暖热了，才咽下去。

有次，外地煤矿来要人，生产队没人报名，新民想去，不过是为着能吃上个热饭。有人说，这个娃去不成。

当兵，就更没门了。

新民的叔叔万志成当时在天水当兵，他受的牵连不大，只是有次部队要给他提干，他居然拒绝了。提干要写亲属关系，还要外调、政审，还是不要惹麻烦了吧。

二姐新惠想来看看新民，婆家人不准，说，还跟那反革命的儿子打啥交道呢。新惠忍了。过年时，新惠又提出来，想给娃几个钱，婆家还是不同意，新惠说，我空人去看一下，行不？结果依旧。新惠只能把眼泪往肚里咽，她记得父亲说过，忍忍忍，饶饶饶，忍字就比饶字高。听到旁人说父亲的凉话，她更是一忍就过去了。

杨伟名死后，红卫兵还来抄过两次家。一年后的一天，新民重新盘炕，掏烟囱里的灰给地里上肥，结果掏出碗口大两卷材料来，是父亲写的。新民吓坏了，爷呀，咋还有这东西呢！当下烧了。

苦日子捱了快十年，一九七七年，新民结了婚。这时经济搞活，可以单干了，新民干上榨油的活，苦归苦，总是一点点攒钱，日子好起来了。如今新民五十七岁了，还在一家饭馆帮工，每天蹬着三轮车买菜，来来回回，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杨伟名的儿子。

新民两个儿，大儿杨力二十六岁，今年（二〇〇九）五月结婚，小儿杨旭在外地打工，都当过几年兵。杨力连队的指导员是户县人，有次在报上看到杨伟名的事迹，他没听说过，问杨力认识这个人不，杨力说他是我爷，指导员就激动得很，说咱户县还有这样的人物，真光荣。

在杨力看来，爷爷当年的观点，批判也没有用，在实践中才能试出谁对谁错。